

# 令鹤起舞：人与动物的社会契约

曲 枫

本期的焦点话题是人与动物的关系。

20世纪80年代之后，社会史、人类学、动物史等学科兴起了去人类中心主义的理论诉求。在以人类中心主义的传统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研究中，社会概念并无动物的地位，社会即人类社会，文化即人类文化。动物在人类的视界中不过仅仅是物质资料的提供者。相对人类的主体地位来说，它们扮演了一个客体角色。然而，进入20世纪末期，尤其21世纪，随着生态危机、气候变化、环境灾难、物种濒危、资源枯竭、可持续发展、全球化成为当下国际社会的中心议题，动物的社会性与能动性被充分发掘出来。“动物转向”因而成为“后人类史学”的重要特征。

挪威考古学家克里斯汀·阿姆斯特朗·欧玛（Kristin Armstrong Oma）认为，无论在狩猎社会还是牧业社会，人与动物之间存在着一个社会契约。二者的关系是社会互动式的、互惠的和互相依存的。人类行为为社会契约所规范；反之，动物亦然。动物之所以成为动物是因为人类的存在，而人类之所以成为人类也是因为动物的存在。动物与人共同成为社会成员，共同拥有社会（Armstrong Oma 2010）。这一认识有着非常重要的当下意义。法国人类学家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对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发现当代文明的“现代性”（modernity）完全建立在人的人性之上（humanism），而忽略了非人生命的人性（Nonhumanity），从而割裂了自然与社会的

关系,使“外在自然之法”(laws of external nature)与“社会常规”(conventions of society)处于分离状态,以蛮力摧毁自然与文化的“近似整体性”(near-totality),实际上使人类进入一个“非现代的世界”(nonmodern world)(Latour 1993)。

人与动物之间的社会契约性关系清晰体现在北极地区的历史文化之中(曲枫 2020)。本期作者安德烈·古谢夫等人的论文描述了西伯利亚北冰洋沿岸亚马尔半岛的驯鹿牧放的历史。考古发现证明,不晚于公元前1世纪,亚马尔地区的先民已开始使用驯鹿雪橇。在中世纪,牧放驯鹿已成为当地特色经济。精心制作的鹿角挽具以及挽具锁扣显示出人与驯鹿之间默契及合作关系的形成。美国史密森学会克罗维尔有关阿拉斯加因纽特人捕鲸技艺的论文表明,捕鲸对于北极民族来说是其神圣信仰的一部分,捕鲸的准备工作以及捕鲸活动本身具有高度的仪式性。在捕鲸归来时,捕鲸船队首领的妻子必须在冰缘吟唱,迎接鲸的到来。她还要向死去的鲸鱼喂食淡水,以示尊重和敬意。盛淡水的桶用鲸须制作而成,其配件上有时雕刻着北极熊和鲸鱼的形象。在秋天和冬季的节日中,鲸鱼的灵是最为尊贵的客人。人们相信在仪式中得到赞美的鲸鱼在来年会自愿重新奉献给人类。人与动物之间的互惠关系在仪式中得以充分建立。安妮·哥特弗莱森等人的论文为我们叙述了人类在格陵兰北部的水域中与海象长达1000年的互动的历史。无论在前因纽特时代的的多赛特社会中,还是在之后的图勒时代的因纽特社会中,人格概念被赋予到了海象等动物的身上,海象被视为“人外之人”(other-than-human persons)。考古数据证明,人类与海象的亲昵关系通过各种方式表达出来,如用海象牙或海象骨制作各种各样的护身符,伴随海洋猎人进行捕猎活动。海象的头骨按照一定的规则被摆放在特别的地方。对海象的狩猎结群方式使因纽特人形成了独特的社会组织形式。因而,海象成为北极人类历史进程形成的有力推动者,与人类一样具有能动性和主体地位。另一篇有关海象的论文来自俄罗斯人类学家爱德华·兹多等人。他们对楚克奇人捕猎海象活动的民族志调查显示,无论一个当代楚克奇人的信仰是传统萨满教还

是当代基督教，他们都会举行与海象形成互动关系的混合各种信仰的仪式。在捕猎前或者捕猎后，猎人与海象之间有一个分享仪式。猎人在仪式中要与海象的灵魂交谈，并表达对海象的感激之情。

吉·安·多勒智耶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民族志案例研究。俄罗斯卡尔梅克共和国流行一个人与鹤共同参与的“令鹤起舞”仪式。仪式中，当地妇女弹奏着冬不拉，在春天或秋天的旷野中迎接鹤的来临。鹤会伴随着音乐云集、舞蹈。当地的村民相信，仙鹤清楚地知道属于它们自己的鹤的旋律。因为“它们和人一样，很聪明”。孙贺的论文则探讨了中国鄂伦春人吕日格仁舞的表现形式，其中描述了别具特色的《斗熊舞》。舞蹈名为“斗熊”，实则表达了人熊之间自古就已形成的亲缘关系。

陈祥军的论文触及到了一段令人痛心的人与动物关系失衡的历史。普氏野马至少在几千年以来就是新疆准噶尔盆地的主人。然而，自19世纪末开始，普氏野马被欧洲人疯狂盗猎运往欧洲，再加上其他国内外外来人的捕杀，在短短几十年中便惨遭灭绝。其实，人类中心主义在全球现代化进程中一直扮演着一个毁灭自然物种的角色，普氏野马并非孤例。令人庆幸的是，在与国际社会的合作下，中国政府于1986年在野马的家乡实施了“野马还乡养殖和野化放归荒野”工程，从英、法等国引进了一批幸存的野马后裔，建立了研究中心。2001年，研究中心开始了野马放归荒野计划。如今，当地的哈萨克牧民在努力尝试重建人类与野马的相互依存关系。

俄罗斯考古学家图帕西娜和图帕欣的论文展示了史前捕鱼活动如何塑造了人类的经济结构、生活方式与社会组织形式。传统考古学与历史学一直有个误解，认为人类的定居生活随农业文明的出现而产生。然而，目前高纬度地区的考古发现已屡屡证明许多北极与次北极地区的捕鱼族群以及像因纽特人那样的海猎者早已采用了定居方式，甚至形成了与农业社会相似的村落。比如，类似的渔猎定居模式已在黑龙江流域、嫩江流域的新石器文化中大量发现。那么，建立在渔业定居或海猎定居之上的社会组织是如何运作的？捕鱼/海猎与陆猎活

动为什么需要不同的居住方式与社会组织策略? 渔业/海猎定居与农业定居的区分以及社会组织运作的相似之处与不同之处又在哪里? 这些问题显然需要通过更多的研究工作来回答。

从本期开始设立“前沿观察”(Observations on the Frontier)栏目, 将以中、英文双语形式发表当下北极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的热点问题。本期前沿观察论文为俄罗斯人类学家爱德华·兹多等人所著的《当代楚科奇人与海象传统知识研究》。

### 参考文献

曲枫

2020, “平等、互惠与共享: 人与动物关系的灵性本体论审视——以阿拉斯加爱斯基摩社会为例”,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 第二期, 2-8 页。

Armstrong Oma, Kristin

2010. Between Trust and Domination: Social Contracts between Humans and Animals. *World Archaeology*, Vol. 42 ( 2 ): 175-187.

Latour Bruno

1993. *We Have Never Been Moder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